

· 专题研究 ·

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发展演变、特点 及政治影响探究

苏 璞

内容提要 也门萨拉菲运动是全球萨拉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是也门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 30 多年的时间中，也门萨拉菲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分化的过程。萨拉菲分化为寂静派、活跃派和少量圣战派；其教义思想被也门传统社会所接受，在实践活动中日渐带有也门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甚至部落主义的印记，“跨国化”和“也门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征。2011 年，也门爆发的政治动荡为萨拉菲活跃派组建政党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提供了契机，未来萨拉菲运动将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复杂互动中对也门政治转型施加影响。

关键词 宗教政治 也门 萨拉菲 寂静派 活跃派 跨国化 也门化

作者简介 苏璞，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萨拉菲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拔斯王朝中期伊斯兰教法学家阿赫穆德·伊本·罕百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近代的瓦哈比运动、赛努西运动、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以及穆斯林兄弟会早期的运动都受到过萨拉菲思潮的影响。“九·一一”事件后，萨拉菲思潮被认为是恐怖主义、圣战活动和宗教激进主义产生的催化剂。2011 年中东地区发生政局动荡以来，分布在多个阿拉伯国家中的萨拉菲运动迅速崛起。自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后，也门萨拉菲运动逐渐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完备的组织结构，并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力量脱颖而出，与也门其他传统宗教派

别特别是苏菲主义、栽德派，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和穆斯林兄弟会相抗衡。

20世纪80年代萨拉菲运动在也门的出现是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政府推进瓦哈比思想在全世界传播的产物。尽管思想和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沙特影响，但在30多年的发展中，萨拉菲运动逐渐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与也门社会相融合，并越来越具有“也门化”的特征。实际上，萨拉菲在也门的发展不仅折射出当代也门经济发展、宗教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且反映出也门国内和全球萨拉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2011年中东剧变发生后，政治伊斯兰势力在多个国家影响力上升。作为也门一支重要的政治伊斯兰力量，萨拉菲运动在也门政治动荡中，通过组建政党的合法途径参与政治进程，尽管其对也门的政治影响力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也门政治版图中不容忽视的一支社会政治力量。本文介绍也门萨拉菲的发展历程及其流派、结合其在也门的实践活动，分析也门萨拉菲运动的特征，并展望这一新兴政治力量对也门政治重建进程的影响。

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流派

萨拉菲（al-Salafiyyah）源于“虔诚的先辈”一词，劝诫穆斯林应恢复伊斯兰原初精神，严守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再传弟子时代及三传弟子时代的伊斯兰教，因此又被称为“尊古派”或“循古派”。主要思想包括：重新强调绝对的“认主独一”思想，反对人和真主之间存在中介的说法，禁止神化和崇拜圣人、圣墓；主张严格按照字面意义解释《古兰经》和“圣训”，声称《古兰经》和逊尼派的权威圣训可以有效引导所有时代的穆斯林，谴责信仰和实践上的革新（Bida）；在教法上，拒绝盲目追随四大教法学派，不固定隶属于某一个具体的教法学派（Taglid，泰格利德），强调直接根据经训进行教法判断。在《萨拉菲：统治和基础》一书中，埃及萨拉菲派学者艾哈迈德·法里达写道，“萨拉菲并不仅仅代表个人的伊斯兰观念，也不是泰米叶或者巴兹（1910—1999，沙特阿拉伯当代宗教领袖）所理解的伊斯兰……萨拉菲的目标是保卫我们先辈的信仰以及他们对经训的理解、萨拉菲严格遵循穆罕默德圣人教导我们的传统”。^①

^① Ahmad Farid, *Salafism, Rules and Foundations*, Cairo: Dar al-Aqida, 2003, p. 11.

由于萨拉菲思潮的广义性和处于不断的发展分化中，上述定义不可能详尽概括其全部内容。作为一种社会宗教运动，萨拉菲自产生以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或者思潮，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中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印度的沙·瓦利乌拉（Shah Wali Allah, 1703—1762）、也门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沙卡尼（Shawkani, 卒于 1834 年）、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创始人阿富汗尼和埃及的哈桑·班纳都曾受到萨拉菲思想的影响。至现代，萨拉菲已经变成一场复杂的、甚至在不同地区发展趋势互为矛盾的运动。^①当代萨拉菲运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而复兴，直到 80 年代随着沙特阿拉伯政府大力资助瓦哈比学派的全球扩张，萨拉菲运动开始走向全球化和多元化。鉴于萨拉菲思潮或运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为了方便论述，本文仅将“萨拉菲”简单定义为主张回归伊斯兰原初教义以实现纯洁伊斯兰教为目标的社会宗教运动。

也门栽德派学者认为，国内萨拉菲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是邻国沙特阿拉伯输出“瓦哈比主义”政策的产物。实际上，也门萨拉菲运动的产生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也门社会政治经济长期落后、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传统伊斯兰宗教文化得以代代相承。20 世纪 60 年代，长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随着栽德派伊玛目统治的终结而结束，然而随后的政治改革并没有真正剔除也门政治中伊斯兰力量的影响，反而为伊斯兰组织（包括萨拉菲运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此外，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分配不公以及以沙特为主的大国势力介入，都催化了也门国内萨拉菲运动的发展。

（一）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发展变化

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创始人瓦依迪，全名穆格比勒·本·哈迪·瓦依迪（Muqbel bin Hadi Al - Wa' idi, 20 世纪 20 年代末—2001），出生于也门北部萨达地区的一个传统栽德派部落（al - Wadi' a）家庭，其部落属于也门较大的巴基利（Bakil）部落联盟的成员。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曾在麦加阅读大量逊尼派的著作，并以其自身所掌握的栽德派知识发现许多神学上的错误。瓦依迪 5 年后回到也门，进入栽德派主要教育中心之一的哈迪（Hadi）清真寺学

^① Roel Meijer.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9, p. 3.

习，这一时期他为了逃避清真寺中裁德派学者强行进行的“洗脑”而专注于经训的文法研究。^① 1962 年北也门革命后，瓦依迪再次来到沙特，期间他深入阅读了大量宗教典籍，开始形成自己的萨拉菲思想。1976 年，瓦依迪在颇负盛名的麦地那国际伊斯兰大学获得圣训学（Hadith）硕士学位。他本打算在埃及攻读博士学位，但受到埃及政府的驱逐而很快返回沙特。在沙特，瓦依迪因为是“劝善戒恶”组织的积极分子，以及作为朱海曼·乌塔比（Juhayman al-Utaybi）的助手而在 1978 年入狱一个半月。1979 年麦加事件发生前不久，瓦依迪再次入狱 3 个月，随后被沙特政府驱逐出境。

返回也门后，瓦依迪开始传播萨拉菲学说，80 年代初在位于首都萨那以北 250 公里的萨达城外的达玛吉（Dammaj）小镇建立了哈迪斯家园（Dar al-Hadith，意为“圣训家园”）。建立之初，当地的裁德派对其怀有敌意，但在主要来自沙特的也门裔富商的资金援助、与沙特政府有联系的慈善组织以及宗教机构中重要乌里玛的支持下，也门萨拉菲运动形成了以达玛吉哈迪斯家园为核心的包括清真寺、书店等的活动中心，来自埃及、科威特和麦加以及麦地那的学生都到此求学。如今，也门萨拉菲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穆罕默德大教长、叶海亚·哈祖里和阿布·哈桑·马里比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都是瓦依迪的学生。90 年代末，在达玛吉学习中心发展高峰时，居住着近 1 000 名学生，所有人都获得免费食宿，学习的课程包括：伊斯兰教法学（fiqh）、认主学（tawhid）以及圣训学（hadith），此外还教授当地居民语法和书写。^② 1990 年之前，萨拉菲在也门南部的发展长期受到苏菲派和社会党的抵制。因为对也门南部的社会党人怀有敌意，萨拉菲运动曾强烈反对也门南、北统一。1994 年夏季内战后，也门社会党失势，萨拉菲开始在也门南部进行伊斯兰复兴活动。

随着 1990 年也门统一后，也门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在多党制、宪政选举以及议会制的冲击下，也门萨拉菲内部分化出了一个新的慈善协会名为“希克玛”（al-Hikma，意为：也门智慧慈善协会），由瓦依迪从前的学生艾哈迈德·哈桑·穆阿利姆（Miallim）和穆罕默德·马赫迪（Mahdi）以及阿布杜·阿齐兹·杜巴里等在也门西南部的塔兹地区建立。希克玛协会的建立

^① Laurent Bonnefoy, *Salafism in Yemen: Transn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Identity*,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1, p. 55.

^② Ibid., p. 59.

是萨拉菲运动走向机构化的开端。协会通过救助孤儿、建造清真寺和学校为塔兹地区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设施。尽管瓦依迪对其参与社会和政治的行为提出批评，希克玛协会仍表示将继续追随瓦依迪的教义。1992年希克玛内部发生分裂，阿卜杜·阿拉·亚奇德（Yazid）和阿卜杜·马吉德·雷米（Raymi）与其他乌里玛在哈德拉毛的穆卡拉市正式建立了一个命名为伊赫桑（Ihsan,意为“善行”）的协会，这一协会只从事慈善活动。伊赫桑的建立是出于扩大活动地理范围的需要，希望获得新的财源特别是富裕的哈德拉毛商人的支持。希克玛协会和伊赫桑协会的相继建立表明也门萨拉菲内部对机构化和政治参与的不同态度，萨拉菲中主张政治参与的活跃派的出现还受到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沙特的“伊斯兰觉醒”运动的直接影响。

瓦依迪的中心地位和威望使其成为也门萨拉菲运动的象征。2011年7月，瓦依迪去世后留下了数以百计的音像制品、几十本著作、数以万计的追随者和几位相互竞争的继承者，其中最杰出的是叶海亚·哈祖里和穆罕默德大教长以及阿布·哈桑·马里比。这3位领导人引发了也门萨拉菲在政治和宗教领域的一系列重组活动。

首先，随着瓦依迪的离世，在未发生任何公开分裂的情况下，萨拉菲传统机构哈迪斯的中心地位被位于萨那南部70公里的玛巴尔（Ma'bar）中心取代，这个中心由穆罕默德大教长（本名穆罕默德·本·阿布杜·阿拉·雷米）主持。希克玛协会一位成员认为，哈迪斯中心新的继任者哈祖里总是夸夸其词，穆罕默德大教长则更富有学识，实际上，他在玛巴尔负责社会和宗教活动，并与当地部落关系良好。

其次，针对瓦依迪去世后的继承人之争，也门萨拉菲内部掀起了反对阿布·哈桑·马里比（简称哈桑）的论战。哈桑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逃避迫害从埃及来到也门成为瓦依迪的学生。后来，他在萨那以东200公里的马里卜附近建立了自己的教育中心。1999年，创建的名为“慈善和奉献”的组织曾引起争议，但与希克玛协会不同，这一组织并没有受到瓦依迪的公开批评。哈桑与瓦依迪关系亲密，在也门萨拉菲运动中拥有很高的威望。瓦依迪在去世前不久写下的遗嘱中，哈桑在其列入的继承者名单之内。但瓦依迪去世后，哈桑的反对者对此存疑，并针对他的埃及出身，以及他与赛义德·库特卜之间莫须有的联系展开攻击，将他的组织称为“党派”，而不是“慈善组织”。面对寂静派的指责，哈桑与活跃派的希克玛组织逐渐走向和解，2004年8月，哈桑和希克

玛的代表艾哈迈德·哈桑·穆阿利姆在哈德拉毛的萨彦（Say ‘un）城市组织联合会议，这一事件被公认为哈桑走上“党派主义”（hizbiyya）体系的明证。

最后，萨拉菲成员阿卜杜·拉赫曼·阿达尼及其兄弟阿布杜·阿拉在亚丁郊区自己建立机构引发了继哈桑之后的另一场影响较小的分裂。瓦依迪的继任者哈祖里成为反阿达尼兄弟的领军人物，谴责他们实行“政党主义”和背叛了瓦依迪的教义。哈祖里宣称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使人们远离达玛吉并建立自己的政治党派。这场争论导致哈祖里的合法性危机，对同为萨拉菲竞争者的敌意以及过于关注细枝末节，使得哈祖里不可能取代瓦依迪在也门萨拉菲中的神圣地位。瓦依迪去世后的论战严重分化了也门萨拉菲运动。

（二）也门萨拉菲的主要派别及其思想主张

如上所述，也门萨拉菲运动内部在对待是否参政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从而导致其分化为具有不同倾向的派别，主要是以瓦依迪为代表的寂静派（Quietist Salafism）、希克玛协会代表的活跃派（Activist Salafism）以及少量激进圣战派。也门萨拉菲运动中的激进派，最引人注目的是宣布遵循萨拉菲教义的极端主义组织安萨尔·沙里亚（Ansar Al - Sharia，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安萨尔·沙里亚作为一个武装组织首次出现在 2011 年 5 月控制阿比扬的省会津巴吉尔后，其构成人员复杂，其中大部分是 1990 年参加过阿富汗反苏圣战后回国的圣战分子，还有亚丁 - 阿比扬伊斯兰军队（Islamic Army of Aden - Abyan，20 世纪 90 年代专门针对西方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的成员，领导人是来自亚丁 - 阿比扬组织的哈立德·阿卜杜勒·纳比（Khalid Abdul - Nabi）。尽管纳比否认与“基地”组织有任何联系，但他本人的思想与基地组织接近，安萨尔·沙里亚组织明确地赞成圣战运动，以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手段来表达宗教极端主义诉求。激进圣战派虽然人数很少但影响恶劣，鉴于资料受限，本文主要介绍对也门社会影响更广的寂静派和活跃派。

1. 寂静派

又被称为传统萨拉菲或正统派。这一分支在教义上要求严格遵守中世纪萨拉菲思潮的主张，对《古兰经》和“圣训”进行逐字逐句的字面解读，反对以理性对经训内容进行解释，要求严格履行伊斯兰教义和教规。在礼俗和行为方面相当保守：要求穿戴萨拉菲标志性的头巾和阿拉伯长袍，对衣服的长度有严格的规定，蓄须并反对男女相处，拒绝同女性握手，反对妇女参政；禁止卡特、香烟和水烟；反对音乐、绘画、戏剧和雕塑等现代艺术。

这一派别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个人应远离充满腐败和分裂的社会以及政治领域，并反对运动的制度化，包括建立慈善组织，认为任何人为建立的机构都不是对真主的完全忠诚；强调远离政治，反对建立政党，禁止参加政治选举或提名候选人。其网站公布的入学条件包括：“必须是将采用萨拉菲方式的逊尼派穆斯林，这里没有党派成员的立足之地；有家庭者必须先独自前来，直到获准携带家人；年龄不限，不需要提交照片、证明文件、毕业证书或者其他证书。”^① 瓦依迪的继承者之一穆罕默德大教长表示：党派主义是“违法的”，代表着“疾病”和灾难，也门统一以来组织的各种选举“使国家和信众四分五裂”^②；对于现代民主观念，瓦依迪认为民主原则使得“权力来源于大多数人而不是真主”，他说：“民主意味着人们统治自己，而真主什么也不能统治！”^③；瓦依迪甚至反对其追随者参加军队或者警察，因为这些部门要求剃须。此外，萨拉菲主张对统治者只能私下提供建议而不能发动革命，反对暴力夺权。基于此，萨拉菲与萨利赫政府一直保持着合作的关系。寂静派长期以来代表着也门萨拉菲运动的主流，瓦依迪去世后，其继任者哈祖里继续遵循他的思想，号召成员远离政治活动并反对政党政治。事实上尽管他们拒绝直接参与政治，但从未远离过政治活动，近年来寂静派与萨利赫政府关系密切，在反恐战争和政府与萨达的胡塞武装对抗中都有萨拉菲的身影。

2011年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政坛剧变，继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领导人相继下台之后，也门国内爆发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与其他伊斯兰运动或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革新党等）迅速参与反政府阵营不同，哈祖里领导的萨拉菲寂静派表达了忠于政府的立场。寂静派强调，根据教义民众骚乱反对执政者是非法的，对在骚乱中表现活跃的青年和穆斯林兄弟会提出谴责，认为骚乱的受益者将是“伊斯兰的敌人”。作为萨利赫政权最后的支持者，这一立场使得寂静派不仅陷入孤立，而且其内部也出现要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呼声，最终哈祖里不得不放弃对萨利赫政府的忠诚，转而对新的也门总统哈迪表示支持。

2. 活跃派

这一派别相对于寂静派远离政治的主张，代表着也门的政治萨拉菲主义。

① [Http: //www. muqbel. net/old/dammaj/index. htm](http://www.muqbel.net/old/dammaj/index.htm), 2012 - 07 - 12。

② Muhammad al - Imam, "The Danger of Party Politics", in Laurent Bonnefoy, op. cit. , p. 61.

③ Federal News Service, *Salafis in Yemen: Caught in The Revolution?* Washington, D. C. , 2012, p. 7.

活跃派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希克玛协会的建立而出现，其主张是穆斯林兄弟会和瓦依迪代表的寂静派观点的中和。他们仍然保留着萨拉菲的特征：穿着长及脚踝的阿拉伯长袍和蓄须。其两种刊物《古兰经的证明》（The Qur'anic Proof）和月刊《论坛》的文章都体现了对瓦依迪思想的继承：包括尊重萨拉菲的习惯和规则，遵守萨拉菲的观念并对什叶派和苏菲派提出谴责等。尽管如此，其与寂静派的分歧集中于机构化和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塔兹地区希克玛协会的领导人阿奎尔·马克塔里（al-Maqtari）表示，这种正式的机构化保证了管理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宣教的有效手段。

希克玛协会成立后，积极参与也门政治活动，通过支持或直接向南部部分地区提名候选人的方式参加了 1997 和 2003 年议会选举。为了遵守萨拉菲教义，他们提名的候选人都不提供照片。但直到 2011 年也门爆发骚乱为止，希克玛协会对支持独立候选人还是公开支持各党派包括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提名的候选人的立场始终模糊不清。正如伊斯兰革新党（Islah）成员纳赛尔·叶海亚所说：“希克玛提出与我们合作，但他们对自己没有清楚的定位和目标。他们是政治团体吗？还是慈善组织？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①。2011 年也门的政治动荡使得活跃派参与政治进程的速度加快，在埃及光明党获得成功的直接刺激下，2012 年 6 月 17 日萨拉菲活跃派成立了第一个政党——也门拉沙德联盟（The Yemeni Rashad Union），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也门萨拉菲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社会慈善工作，包括水资源项目，成立古兰经学校，援助孤儿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拉沙德联盟成立标志着也门萨拉菲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毫无疑问，2010 年底中东剧变以来，分布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萨拉菲运动迅速崛起，也门萨拉菲活跃派也以此为契机进入政治舞台崭露头角。2012 年 7 月 2 日，拉沙德联盟的秘书长阿布杜·瓦哈卜·胡麦卡尼（Abdulwahab Al-Homaiqani）在接受《也门时报》记者的采访时明确提到：萨拉菲政党的目标是以公正和“舒拉”（协商）的方式实现也门复兴、保卫也门的主权与利益。^② 面对国内外对建立政党与萨拉菲反对参与政治的主张相悖的质疑，胡麦卡尼强调萨拉菲不反对政治活动，而是反对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认为这

^① Laurent Bonnefoy, op. cit., p. 66.

^② Dr. Mohammed Mossa Al - Ameri Speaks to the Yemen Times, <http://www.yementimes.com/en/1634/interview/1751/Dr-Mohammed-Mossa-Al-Ameri-a-religious-sheikh-speaks-to-the-Yemen-Times.htm>, 2014-05-07.

是对伊斯兰教义的背离。对于民主问题，萨拉菲内部存在争论，但 2012 年拉沙德联盟领袖穆罕默德·穆萨·阿米里 (Dr. Mohammed Mossa Al - Ameri) 认为伊斯兰历史上的“协商”原则就具有民主含义，“民主”具有立法与哲学以及程序化的双重含义，其中立法与哲学含义不符合伊斯兰精神，因为伊斯兰的法律来源于真主和沙里亚法。而拉沙德联盟可以实施参加选举、提名候选人等民主程序。^① 值得一提的是，拉沙德联盟虽然肯定妇女和男子拥有同样的权利，但反对妇女掌握重要的军事职位。此外，拉沙德联盟的成立受到了仍强调反对建立任何政党的萨拉菲寂静派的抵制和反对，这意味着也门萨拉菲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将严重削弱其在也门政治重建中的影响力。

当代也门萨拉菲的特征

也门的萨拉菲运动是全球萨拉菲运动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不仅是沙特政府向世界输出本国宗教学说的产物，还是也门和沙特两国跨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当代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也门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对其支持者，萨拉菲的崛起代表着伊斯兰教的复兴，是对社会道德堕落和对经训误读的终结；而对其反对者，从服饰特征到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严格规定与也门的文化和历史相抵触。本文认为，也门萨拉菲运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 跨国化

萨拉菲运动的教义、历史、根源和社会活动都呈现出跨国活动的特点。萨拉菲教义具有普遍性，在达玛吉、利雅得或者雅加达对一个伊斯兰问题的理论解释都是相同的。来自乌里玛的宣教或对于圣训的评注，无论其民族、年龄和地位都适用于所有信教者。这种普遍性被认为是萨拉菲教义的核心特点之一。因此，全球各种萨拉菲运动具有跨国性、跨地区性和动态性。

萨拉菲运动在也门的发展受到跨国移民的间接作用和社会、宗教领域相互渗透的影响。也门萨拉菲与半岛其他国家在政治和宗教领域间的联系途径

^① Abdulwahab Al - Homaïqani, Secretary - general of the Yemeni Rashad Union to the Yemen Times, Interview with the Yemen Times, <http://www.yementimes.com/en/1586/interview/1081/Abdulwahab-Al-Homaïqani-secretary-general-of-the-Yemeni-Rashad-Union-to-the-Yemen-Times.htm>, 2014 - 05 - 07。

多样,包括高等院校、书店和萨拉菲的清真寺,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民间交往进行。其跨国化特征表现在:第一,音像制品、宗教卫星频道以及社交网站等新兴媒体成为也门萨拉菲传播的主要手段。在萨那、玛巴尔、亚丁和塔兹等地萨拉菲的书店中,陈列着上千种来自不同国家的录音带——许多来自也门和沙特,还有一些来自埃及、叙利亚和阿联酋。这些磁带质量低劣但价格低廉,传播有效而简便;此外,尽管瓦依迪反对收看电视新闻,但希克玛协会和阿布·哈桑仍运用媒体传播思想,来自沙特或者科威特的卫星广播每天都在宣教。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成为也门萨拉菲跨国化活动的有力支持。许多国外网站(如著名的“www.sahab.com”)中的论坛在对阿布·哈桑的论战和阿达尼兄弟等事件中表现活跃。所有也门萨拉菲运动的主要人物都拥有自己的网站,不过互联网在也门国内的作用有限,更多地表现为扩大了也门萨拉菲在国外的影响力。第二,人员跨国流动。除了传统的也门海外打工侨民传播着萨拉菲教义之外,来到达玛吉求学的外国学生也是其跨国性的重要表现。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来自西非、西欧、印度尼西亚、北美的外国学生来到也门萨拉菲教育中心求学,使得也门成为萨拉菲著名的全球中心。第三,跨国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也门与沙特之间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毫无疑问,也门萨拉菲运动深受邻国沙特的影响,不仅因为其奠基者瓦依迪曾在沙特生活和学习,还包括长期以来沙特政府通过经济援助和培植“代理人”的方式影响着也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此外,也门也是沙特政府积极向世界传播其“瓦哈比”宗教学说的主要阵地,沙特政府在这里赞助清真寺和宗教机构,在宗教学校设置奖学金和发放宗教宣传资料,并提供可观的资金援助,瓦依迪和哈迪斯家园“每两个月通过阿布杜·阿齐兹·本·巴兹教长获得沙特政府总数为 15 000 里亚尔(约合 6 000 美元)的援助^①。因此,对其反对者来说,也门萨拉菲运动是来自沙特的“舶来品”,完全代表着沙特的国家利益。也门传统裁德派的真理党(al-Haqq)一位成员曾在 2006 年气愤地表示:“裁德派不再存在,在我们国家只有瓦哈比主义!”^②事实上,也门萨拉菲本身反对“沙特化”的指责,他们更强调萨拉菲运动在也门的“本地化”特征。

^① Laurent Bonnefoy, op. cit., p. 151.

^② Interview with the Yemen Times, 1 July 1992, in Bernard Haykel, *Revival and Reform in Islam: The Legacy of Muhammad Al-Shawka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7.

（二）也门化

萨拉菲的也门化指其在发展中与当地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相互作用、渗透，在不断的冲突与适应中逐步获得认同并融入当地社会。

爱德华·赛义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迁移学说”（Transplantation）中提到：“和人员的流动一样，评论、观点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在不同的人群、地域和时期传播……这些运动到新的环境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必然产生与发源地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机构，这使得理论和观念的迁移、转移和流通变得复杂”^①。尽管“迁移理论”和跨国关系以及社会变革相关，就迁移本身而言，爱德华·赛义德强调一种运动或思潮在全新环境中的发展必然在当地传统力量的抵制中不断地调整 and 适应，重组并革新社会实践活动。也门萨拉菲运动的迁移过程就是重新定位和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相互作用又充满矛盾的不同变量。也门萨拉菲运动既不愿意作为沙特利益的“代理人”，也没有严格追随瓦依迪及其继承者建立的学说，本地化成为最重要的特征，其获得认同的方式主要有：第一，在起源方面，针对反对者（主要有也门裁德派、苏菲派和穆斯林兄弟会）指责其为沙特的“舶来品”，也门萨拉菲极力证明其运动的内生性。在也门政治中，各种伊斯兰组织和运动都努力证明其发源于也门的正统地位，寻求其作为也门历史和社会的固有部分的可靠证据，被指责为渗入也门的敌人和完全非法的萨拉菲运动迫切需要证明其来源。也门人认为自己是盖哈坦人的子孙，现代的也门人大都可以追溯到盖哈坦的后裔希木叶尔和凯赫兰这两人。据此，也门萨拉菲声称自己来源于盖哈坦部落，比裁德派和苏菲派等其他伊斯兰派别更有资格代表真正的也门人。实际上，起源之争要复杂得多（公元 8 世纪裁德派产生于中亚和米索不达米亚地区，直到 9 世纪末才进入阿拉伯半岛；而苏菲主义在也门哈德拉毛地区的跨国化活动也是其外生性属性的例证），至今仍没有定论。起源之争是萨拉菲运动试图在也门社会获得认同的重要表现。

第二，在教义方面，萨拉菲强调回归伊斯兰教原初教义，他们声称大众传统包括革新已经侵蚀了伊斯兰教，这导致伊斯兰教教规（逊奈）的消失。而萨拉菲要改变这些，当被问到也门萨拉菲运动的传播原因时瓦依迪回答道：

^①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30.

“也门逊奈运动的传播与两件事相关：其一，也门逊奈运动起源于也门：圣人穆罕默德派穆阿德·阿布·穆萨、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哈立德·本·瓦利德来此传教，这些人也是萨拉菲的领袖，所以这是对本源的回归。其二，如今的也门人已做好准备接受经训和传统”^①。阿卜杜·阿齐兹在瓦依迪去世几年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回顾了瓦依迪作为奠基者在也门萨拉菲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但也指出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初萨拉菲就存在，不是简单的舶来品，而是一种再生。当代也门萨拉菲成员坚持认为，他们的运动具有也门历史和文化背景，甚至早在沙特之前就以也门当地传统为基础，其发展是独立的，与跨国活动无关。无论萨拉菲是否真正来源于也门，重要的是其成员极力与其对手指责的“沙特化”脱离关系。

第三，在实践活动中打上了也门民族主义、部落主义的烙印。虽然萨拉菲宣称远离政治，但实际上他们从未彻底脱离政治活动。在政治领域，萨拉菲常常作为政府决策的中间调和力量。2006 年 1 月，穆罕穆德大教长援助不能说服人们接受小儿麻痹症疫苗的也门公共卫生部长，由于许多宗教领袖散布政府的接种疫苗行为实际上是杀害儿童的谣言，萨拉菲领袖向民众保证接种是必要和安全的，并号召人们与政府合作。他们表现出的捍卫民族主义的立场还有：以支持国家的名义，萨拉菲商人谴责世界银行，认为在其要求下开始的也门经济改革使国家债台高筑并带来高通货膨胀。他们同样攻击美国，认为美国“偷了也门的石油，使也门饿殍遍野”。1994 年内战中，萨拉菲通过反对支持南部社会主义党的沙特政府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尽管反对部落主义是萨拉菲教义的一部分，但仍不排除其支持部落主义的立场。20 世纪 80 年代，瓦依迪面对萨达地区裁德派的反对时得到了他所属部落的支持。在多个场合，他承认不同部落的首长提供了很多帮助。尽管瓦依迪指责部落法律代表着前伊斯兰时代，与伊斯兰教法相冲突，部落中严重的等级观念是对倡导穆斯林平等的伊斯兰教义的违背，但瓦依迪也承认在南部社会主义政权和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内政的干涉面前，也门部落是不可或缺和有效的防卫力量。萨拉菲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部落的包容态度表明其已经融入也门社会并体现了国家认同的情感。

^① Muqbil al - Wadi i, “Interview with the Emirati Paper al - Bayan”, in Laurent Bonnefoy, op. cit., p. 236.

第四，通过强调与也门著名宗教学家的联系实现与也门传统文化的融合。萨拉菲首先选择的是19世纪也门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沙卡尼。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连续3任伊玛目政府工作的沙卡尼重新强调了“圣训”的重要性，他的革新学说基本上超越了教派间的分歧，在也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他仍获得尊重，得到具有不同政治或宗教立场的人们支持。从公立大学到小学直到萨拉菲“哈迪斯家园”的研究机构，沙卡尼成为也门宗教身份以及裁德与沙斐仪派别身份渐进融合的象征。他受到也门萨拉菲乌里玛的重视，无疑成为现当代也门萨拉菲运动中的标志性人物。除了关注沙卡尼，还有一位18世纪著名的改革主义人物伊本·埃米尔·萨纳尼（al-Sanani, 1769年去世），希克玛协会通过其研究中心在2005年出版了伊本的《古兰经评注》。此外，分布在也门各地的萨拉菲清真寺或者学习中心中，经常有当地人进入清真寺寻求方法帮助他们重病的亲人或解决生活矛盾，这些超自然的活动与萨拉菲基本教义中的理性主义相冲突，这些活动表明萨拉菲完全融入当地村镇，并通过发挥社会功能获得当地人的认同。

萨拉菲“也门化”的过程涉及也门历史和社会的所有层面，不同宗教和政治运动的对峙催化了也门关于起源和内生性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萨拉菲最初所倡导的远离政治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也门萨拉菲运动开始走向制度化，并逐渐政治化；其学说更具有灵活性，并融入了也门社会的具体内容。

萨拉菲运动对也门政治发展的影响

2011年也门政局变动之后，其国内的政治伊斯兰力量表现活跃，其中萨拉菲运动自身经历分化的同时，对也门政治转型也产生影响：其倡导的在全社会建立伊斯兰价值观，建立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的目标必然带来也门政治中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对世俗主义政治构成挑战。尽管多年来萨拉菲运动通过慈善活动和积极宣教在也门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拉沙德联盟成立后积极参加也门全国对话会议（NDC），推进也门政治过渡。但在也门实力犹存的前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党（GPC）和传统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Islah）以及哈希德和巴基利部落势力主导的也门政治版图中，也门萨拉菲运动通过拉沙德联盟可以施展的空间有限，其对也门政治的影响力还有待观察，目前其影响表现在：

第一，萨拉菲运动激化了也门内部的教派矛盾，并且加剧了沙特和伊朗在也门萨拉菲逊尼派和栽德什叶派问题上的对抗。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瓦依迪在达玛吉传播萨拉菲思想初期，面对的最强大的反对力量就是也门的什叶派分支栽德派。在也门栽德派学者出版的著作中，萨拉菲运动通常被描述为：沙特向也门输出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来自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易卜拉欣·瓦齐尔，一位前伊玛目王朝的栽德知识分子说：“为了渗透到我国，沙特有不同的策略：……也门的瓦哈比成员们，特别是他们的乌里玛，成为企图利用分裂和冲突破坏也门国家和伊斯兰教统一的力量^①”。属于栽德派的胡塞家族领导人建立的“青年信仰者”组织除了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外，其初衷是为了对抗在萨达周围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萨拉菲运动。

面对栽德派的反对，2004 年胡塞叛乱的爆发为萨拉菲运动提供了与政府合作，进一步打击栽德派的机会。在此事件发生前几周，阿布·哈桑·马里比出版了名为《萨达事件的合法观点》的小册子，他将胡塞叛乱行为定义为伊斯兰内部战争（菲特纳），并将政府军与胡塞叛军的战争视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叶海亚·哈祖里在 2009 年政府军与胡塞叛军的第六次战争期间将胡塞叛军描述为黎巴嫩真主党的分支。2007 年 3 月，达玛吉哈迪斯家园的两位外国学生在与胡塞叛军的一次战斗中死亡，证实了部分萨拉菲加入政府军参加战斗的传言。在 2011 年也门骚乱发生后，胡塞武装趁机控制了萨达省及其周边地区。2013 年 10 月 30 日，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达玛吉镇与萨拉菲派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并造成严重伤亡。胡塞势力指责达玛吉的哈迪斯中心已经成为训练宗教极端主义和圣战分子的中心，而萨拉菲强调哈迪斯中心仅仅是教育机构。哈迪政府 2014 年 1 月在首都萨那成立委员会试图和平化解两派武装冲突，尽管最终达成协议，但其中规定达玛吉 15 000 名非本地萨拉菲居民必须迁移出萨达省，本来计划将这些人迁往荷台达省的提哈玛，但受到提哈玛居民的反对，这些失去家园的萨拉菲居民如今只能生活在首都萨那的清真寺或者帐篷中，这无疑将成为当前也门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2009 年 11 月，沙特政府开始越境打击胡塞武装，直接的军事干涉行为使得本属于也门国内的教派冲突打上了大国政治的烙印。沙特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支持萨拉菲主义来遏制伊朗在也门扩大其自身影响力的企图。萨拉菲运动

^① Laurent Bonnefoy, *op. cit.*, p. 11.

在也门的发展无疑加剧了以沙特和伊朗为首的地区大国对也门政治影响力的争夺。

第二，萨拉菲运动助长了也门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也门国内分析家普遍认为也门萨拉菲极端主义组织安萨尔·沙里亚是“基地”组织在也门改头换面、开展暴力恐怖活动的新工具。安萨尔·沙里亚组织的领导人哈立德·阿卜杜勒·纳比曾因为被怀疑支持“基地”组织于2008年被萨利赫政府逮捕，在表示与政府合作后获释。安萨尔·沙里亚组织的前身亚丁-阿比扬伊斯兰军队曾是1998年杀害两位西方观光者恐怖活动的策划者。2013年12月28日，也门拉沙德联盟党主席、全国对话会议成员阿卜杜勒·瓦哈卜·哈米高尼就被美国财政部列入所谓的“恐怖主义支持者”名单。美国认为哈米高尼身为也门一慈善机构总裁，利用职务之便聚敛大量资金并将其送往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同时还帮助了沙特基地组织的支持者将资金转移至也门。尽管受到当事人的反对和缺乏确凿证据，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萨拉菲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结 语

萨拉菲运动在也门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文化迁移的动态过程，以及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作用，在正、负迁移的作用下，经历长期的过渡文化阶段，逐渐实现“目标文化”，即融入和适应也门社会。同时，萨拉菲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同一文明（伊斯兰文明）内部不同地域、派别之间动态的交往互动过程。如今制度化已经成为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常态，跨国化和本土化（也门化）的特征则处于错综复杂的动态变化中。当代也门萨拉菲的思想继承了沙特传统萨拉菲的教义思想，在跨国活动和人员迁移中进入也门，经过分化、重新定位和建构，在教义上逐渐被也门传统社会所接受，在实践活动中非政治和非行动主义者演变为政治的、行动主义并带有民族主义、也门地区主义甚至部落主义的印记，最终具有了“外生性”和“内源性”的双重特性。尽管也门萨拉菲一直强调“也门化”的特征，但也从未失去过全球化活动的属性，其成功发展受到跨国关系（移民、财政中心、媒体、商业活动和私人支持）的直接影响。中东剧变以来，也门国内政治伊斯兰力量崛起，其中萨拉菲运动不仅通过倡导纯洁教义、规范人们的衣食住行在也门民众中具有广泛

影响，而且其内部政党化倾向明显，政治参与和自身转型的意识显著增强，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将在未来有所提升。不容忽视的是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发展带来的教派冲突以及少数圣战派的恐怖主义活动无疑将制约其政治影响力的发挥。未来萨拉菲在也门的作用仍取决于其如何克服内部派别分化，对建立政教合一国家激进观点进行改造，积极融入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内容，走上通过合法途径参与政治的道路。

Analysis of the Salafism's Evolution, Feature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Yemen

Su Ying

Abstract: Yemen salafism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salafism campaign .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alafism movement in Yemen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Salafism movement in Yemen has experienced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ree decades. This trend can be divided into Quietist , Activeist and Jihadist factions. In contemporary Yemen, the doctrines of salafism have gradually been accepted by traditional Yemeni society, with the mark of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tribalism in practice.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salafism movement in Yemen are “Transnation” and “Yemenisation” . The 2011 revolutio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Activeist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future, Yemen salafism movement will influenc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ised and adapted.

Key Words: Religious Politics; Salafism; Quietist; Activist; Transnation; Yemenisation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